

##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研究

——以《哈姆雷特》朱生豪汉译本为例

郭雨琦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其翻译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焦点。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学者图里提出了翻译规范理论，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文以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朱生豪《哈姆雷特》汉译本中翻译规范对译者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原因。研究表明，朱生豪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归化策略，注重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其翻译受到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影响。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朱生豪如何在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寻求平衡，使译文既忠实于原著，又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结果表明，朱生豪的翻译策略选择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化使命感，也反映了翻译活动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为翻译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哈姆雷特》；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初始规范；预备规范；操作规范；朱生豪

**【收稿日期】**2025 年 1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2 月 2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83

### A study of Shakespeare's play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y's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Based on Zhu Shenghao's Chinese version of *Hamlet*

Yuqi Gu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Hamlet*, one of Shakespeare's outstanding masterpieces, has long been a focal poi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80s, the Israeli scholar Gideon Toury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 which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oury's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norms on the translator's strategy choices in Zhu Shenghao's Chinese version of *Hamlet*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Zhu Shenghao predominantly adopted th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ith a focus on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ed text in the target culture. His translation was jointly influenced by initial norms, preliminary norms, and operational nor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translation examples, this paper illuminates how Zhu Shenghao struck a balanc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enabling the translated text to be both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 and understood by Chinese readers accurately.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Zhu Shenghao's translation strategy choices not only reflect his profound literary skills and cultural mission but also mirror the crucial rol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Hamlet*; Toury's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 Initial norms; Preliminary norms; Operational norms; Zhu Shenghao

#### 1 研究背景

《哈姆雷特》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最具代表性的悲剧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戏剧之一。该剧全剧围绕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复仇的故事展开。《哈姆雷特》探讨了人类的哲学命题，如生死、

宿命、道德和复仇。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典型人物，具有复杂的心理描写，他的内心冲突、犹豫和哲学思考使得这个人物成为文学史上最具有深度的角色之一。

朱生豪（1913 年-1979 年），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

莎士比亚研究者，是中国莎士比亚翻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被认为是中文莎士比亚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特别是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其语言既传神又生动，富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和诗意。他不仅注重传达莎士比亚作品的原意，还对原作的精神和情感进行了深刻的挖掘，使得其翻译作品不仅准确且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哈姆雷特》汉译本展开了全面且富有深度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基于从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等翻译理论进行探讨。本文将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出发，研究朱生豪译本中翻译规范对译者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翻译规范变化背后的原因。

## 2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概述

在图里看来，翻译是一种必然涉及至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传统的活动，也就是说，在各个层面上至少存在两套规范体系。图里提出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图里，1995）<sup>[1]</sup>，翻译会受到规范的影响。因此，翻译是一种个人行为；然而，它绝非随意或偶然的。相反，人们可以依据制约它的各类规范对其进行追溯和分析。图里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各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包括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及操作规范。

初始规范指译者所作的总体选择。这种选择是在两种不同语言来源做出的，这两种来源分别指来自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制约因素。如果译者的选择倾向原文，恪守原语文化规范，就会得到“充分的翻译”；如果目标文化的规范占上风，就会产出“可接受的翻译”（刘为洁，2013）<sup>[2]</sup>。

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翻译政策指在特定语言、文化或时间里选取哪些文本来翻译的决定因素。翻译的直接性关乎翻译是否通过中介语言，研究的问题包括目标文化是否容许这种做法，当中涉及哪些语言，以及是否掩饰这种做法。

操作规范指译文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内容，即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所选择的风格和语言。它又细分为两类：第一，母体规范它在宏观层面制约着翻译的原则，如具体段落的划分与合并，译本内容和语言的删减或增添等。第二，文本一语言规范决定了文本的微观层面的选择，如使用哪种语言、句式、语法、措辞来代替原语文本的表达等等（帅司阳，2014）<sup>[3]</sup>。

## 3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对《哈姆雷特》朱译本的翻译研究

### 3.1 初始规范

初始规范是指在翻译创作过程中，译者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文的选择做出抉择。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言体系，二者之间的转换必然会导致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取决于译者，他们需要在源语言文化规范与目标语言文化规范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平衡。译者是偏向源语言文化规范，还是目标语言文化规范，这与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密切相关。在图里看来，译者必将会在这两种文化倾向中做出选择。总的来说，朱生豪翻译《哈姆雷特》时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更倾向于目标语言文化，这样就造就了“可接受的译文”。

从译文的可接受性层面看，朱生豪将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可接受性放在了第一位。朱生豪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深陷危亡泥沼，社会百废待兴。彼时的中国，内有积弊丛生、民生凋敝，外遭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清政府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文化领域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文学和文化形式单一，难以满足民众精神需求。朱生豪身为其中的一员，满怀着炽热的爱国之情，周身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对祖国命运忧心忡忡，眷恋着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对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更是满怀敬重与珍视。在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下，朱生豪不仅在英语语言与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对中国古典文化也有深刻的理解，尤其擅长诗歌押韵，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单一的困境亟待改变，迫切希望引入多元文化，让国民能够接触并体验不同的文化理念，从而激发民族的思想活力，为国家的复兴注入精神动力。朱生豪也有着同样的愿景，他将目光投向了莎士比亚戏剧，决意通过翻译这一文学巨擘的作品，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和全新的文学形式引入中国，为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让国人领略到别样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内涵。所以朱生豪在翻译过程中将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可接受性放在了第一位。

从翻译标准层面看，每位译者都有其翻译标准，梁实秋先生也是莎翁作品的忠实译者，其翻译标准是忠实、流利和传神。朱生豪先生却主张“神韵说”，是其翻译理念的核心要素（邢立博，2018）<sup>[4]</sup>。“志在神韵”是其坚持的翻译准则，在忠于原作风格的基础上，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阅读，朱生豪将目的语言文化和行文规范与原作融汇贯通，提高了译作的可接受性。

从文化层面看，尽管《哈姆雷特》的朱译本在语言上有些华丽，但对于目标文本读者来说是可读且易于

理解的。朱生豪倾向于目标语言规范，因为他旨在将《哈姆雷特》介绍给目标文本读者和目标文化。他们对目标语言规范的妥协是为了使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更具可接受性。然而，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在实践中采用任何外化翻译策略。这也是图里认为“译者的选择不会迫使低层次规范完全一致”的原因。

例 1:

原文: Pol. Madam, I swear I use no art at all.

译文: 波洛尼厄斯 娘娘, 我发誓我一点不弄玄虚。

此处, 朱生豪把“madam”译为“娘娘”, 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西方宫廷文化对部分中文语言读者来说会有点陌生, “娘娘”是中国古代对地位尊崇女性的称呼, 和王后身份相似, 能让读者借熟悉符号理解人物、融入剧情, 避免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并且“娘娘”简洁直接、饱含敬意, 贴合中国传统文化, 传达出波洛尼厄斯对王后格特鲁德的敬畏之情, 比将其直译为“夫人或女士”更能体现宫廷等级与人物关系, 更能彰显波洛尼厄斯的巧言令色, 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由此让西方戏剧在中国焕发出无限魅力, 广为传播。

### 3.2 预备规范

预备规范作为翻译规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它主要涵盖了在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下, 于翻译文本选择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在整个翻译流程里, 翻译文本的选择无疑是极为关键的起始步骤。这一选择并非随意为之, 而是深受所处时代主流文化形态以及文艺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环境, 有着各异的文化诉求与审美倾向, 这些因素会驱使译者在浩如烟海的源语文本中, 挑选出契合当下文化语境的作品进行翻译活动。

从译作的接受性来看, 译作的受欢迎程度与其和目的语文化环境的契合度紧密相关。当一部译作能够精准对接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期待视野时, 它就更容易被读者接纳和喜爱。目的语读者往往基于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审美偏好, 对译作抱有特定的期待。若译作与这些期待相符, 便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进而在目的语文化中获得广泛传播。

基于此, 朱生豪在进行文本选择时, 通常会有意识地使自己的选材与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契合。他会考量目的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确保所选文本不会与主流观念产生冲突, 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目的语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朱生豪在大学入学时恰逢遇上国学热浪, 在之江大学的这四年, 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化思想。夏承焘老师认为朱生豪是位旷世之才, 从朱生豪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所特有的洞察力和独特见解, 并称赞他“在古人中亦有苏东坡一人而已”(刘晓琪, 2022)<sup>[5]</sup>。且恰逢此时日军侵国, 这大大激发了他的抗日激情和爱国情怀, 于是, 这使得朱生豪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有了更为慎重的考量, 这不仅仅体现了朱生豪对翻译任务的专业态度, 也反映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 在文化传播与融合过程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 3.3 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是指从微观角度影响译文的因素, 具体而言, 即翻译所采用的技巧和策略。译者所选择的译文的文学风格和语言风格、文本的结构安排以及对某些特定词汇和句子的翻译, 都是译者努力使译文成为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桥梁的体现。正如前文所述, 译文是倾向于遵循源语言的规范还是目标语言的规范, 可以从译文版本中得以追溯。

操作规范又可再被细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母体规范, 该规范所导致的修改并不显著。宏观上对段落或章节进行增补或删减的情况极为少见。朱生豪认为莎士比亚原著《哈姆雷特》中的所有段落和章节对于译文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未对段落和章节进行增补。相比之下, 第二类是更关注文本微观层面的文本—语言规范, 主要包括文本的构成和语言的表达方式, 如翻译实践过程中要考虑句子结构、增译, 修辞、是否需要调整文体特征等。因此, 下文内容主要聚焦于对朱生豪《哈姆雷特》英译本的文本—语言规范。

例 2:

原文: Fran. For this relief much thanks.

Tis bitter cold, and I am sick at heart.

Ber. Have you had quiet guard?

Fran. Not a mouse stirring.

译文: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 天冷得厉害, 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勃那多, 你守在这儿, 一切都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威廉·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2018)<sup>[6]</sup>

根据上下文语境可知, 此场景指的是士兵交替岗, 但士兵们不愿值班, 抱怨天气寒冷, 译文中增译了“老大”这一程度副词, 在汉语中“老大”该词可被理解为“很”“非常”等类似含义, 不仅是对周围环境严寒的描述, 也暗指他内心的孤独、恐惧或不安预计对未

知的恐惧。这种双重的不适感烘托了当时的紧张氛围。

朱生豪将“Not a mouse stirring”直译为“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保留了原文的夸张手法，暗指丹麦王国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为后文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做铺垫。

例 3:

原文: King Take thy fair hour, Laertes. Time be thine,  
And thy best graces spend it at thy will.

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and my son?

Ham.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 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th'sun.

译文: 国王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 雷欧提斯, 尽情发挥你的才能吧! 可是, 来, 我的侄儿哈姆雷特, 我的孩子——

哈姆雷特(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 漠不相干的路人。

国王, 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雷特, 不, 陛下, 我已经在太阳下晒得太久了。  
(威廉·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2018)

克劳狄斯称呼哈姆雷特为“my son”, 而哈姆雷特回应“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th'sun”。此处“son(儿子)”和“sun(太阳)”发音相同, 构成谐音双关。哈姆雷特表面上回答自己在太阳下晒得太久, 实际上是借“sun”与“son”的谐音, 隐晦地表达对成为国王克劳狄斯“儿子”这一身份的抗拒。他对克劳狄斯杀父夺位而后迎娶母亲的行为充满怨恨, 内心根本不愿承认克劳狄斯这个“父亲”, 被迫接受让他感到痛苦。朱生豪通过延用原文这种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 既符合哈姆雷特作为王子在宫廷中需恪守礼仪的情境, 又巧妙地宣泄了他内心的不满, 展现出他机智却压抑的性格, 使人物形象得以跃然纸上。

例 4:

原文: Queen Came this from Hamlet to her?

Pol. Good madam stay awhile, I will be faithful.

'Doubt thou the stars are fre,

Doubt that the sun doth move,

Doubt truth to be a liar,

But never doubt, I love.

译文: 王后 这是哈姆雷特写给她的吗?

波洛尼厄斯 好娘娘, 等一等, 听我念下去:

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

你可以疑心太阳会移转;

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

可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威廉·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2018)

朱生豪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诗歌写作手法, 这种手法注重意象的运用和情感的含蓄表达。在翻译时, 朱生豪通过“星星”“太阳”“真理”等意象, 巧妙地传达了哈姆雷特对奥菲莉娅内心深处那种炽热且坚定的爱。这种表达方式与诗歌中通过自然意象来表达情感的手法不谋而合。此外, 诗歌的韵律感和节奏感, 使得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 这不仅增强了译文的文学性, 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 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爱情的美好。

例 5:

原文: Ham.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译文: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勇敢?(威廉·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2018)

朱生豪在译文中增译了“值得考虑的”, 将原文中“question”所隐含的思考、权衡之意明确化, 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也让读者能更清晰地理解哈姆雷特内心对生死抉择的审慎态度。同时, 在“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翻译为“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时, 增加了“暴虐的”来修饰“命运”, “毒箭”强化了“slings and arrows”的伤害性, 生动地展现出命运的残酷, 增强了文章的渲染力。

#### 4 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贯穿了朱生豪翻译活动的始终, 为翻译活动注入了活力。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 本文从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出发, 深入探讨了朱生豪翻译《哈姆雷特》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及其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分析, 揭示了朱生豪如何在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寻求平衡, 使译文既忠实于原著, 又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朱生豪的翻译活动不仅为中文读者带来了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 推动了莎翁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戏剧的发展。他的译本充分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同

时也彰显了翻译活动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中西方文化得以相互碰撞与融合。

### 参考文献

- [1]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5:56-58.
- [2] 刘为洁.从 Toury 翻译规范视角解析梁实秋的译莎活动[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5(08):36-41.
- [3] 帅司阳.从翻译规范论的视角看《聊斋志异》的两个译本[J].艺术百家,2014,30(S1):355-358.
- [4] 邢立博.基于神韵说下的朱生豪翻译思想分析[J].文学教育(下),2018,(02):26-27.
- [5] 刘晓琪.朱生豪文学创作研究[D].济南大学,2022,51-53.
- [6] 威廉·莎士比亚,朱生豪译.《哈姆雷特(中英双语珍藏版)》[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7] 彭劲松,李海军.描述翻译学:发展轨迹及理论创新[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7(04):50-53.
- [8] 任娟.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形象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3,(24):11-13.
- [9] 苏福忠.说说朱生豪的翻译[J].读书,2004,(05):23-31.
- [10] 徐修鸿.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争议与反思[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49-54.
- [11] 赵侠.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译者抉择[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20(01):59-6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